

圣经阐释的必须和必然

——读梁工主编《西方圣经批评引论》

陆 扬

在历史批评兴起之前,西方基督徒读圣经通常是非常现实主义的,字词句的意思就是它们正确描述的真的事件和真实的真理,这些事件和真理只能如此表达,换个说法都不行。圣经的其他读法是允许的,比如说精神和寓言义的阅读,但是字面义的阅读势必为先。奥古斯丁一马当先的历代基督教神父们,就想象真实世界的形成,适如圣经故事所娓娓道来。这个时间世界涵盖了从创世到最后审判的所有时代,包括人类自然环境,同样也包括我们经常以为是人类自我发明,叫做“历史”和“文化”的第二自然环境。

但是后来圣经故事的现实主义读解分崩离析,字面义和历史义危机深重,圣经的比喻义阅读模式本来一直是一种字面主义,但是很快比喻义多多少少成为字面义的反义词。圣经叙述的字面义和比喻义阅读曾经是天然的盟友,现在不仅各奔东西,它们的继承者也面面相觑,不知所以。历史批评和圣经神学本是两回事情,各有神通,结果却硬是给捆绑到了一起。所以圣经需要阐释。可是圣经的阐释和文学的阐释又有什么不同吗?它们可能是同一回事情吗?另外,圣经据信是神所口授,它能算是一个文本吗?而文本除了有语词义,还有宗教意义、观念意义,以及时而要强调出来,以示有别于“纯粹”语词义的主题。主题又是什么?它是内在于文本呢,还是纯粹是读者将文本置入其中的某种框架?如此等等思考下来,圣经的阐释以及作为文本的批评,无论如何就是势在必行的了。

梁工教授主编的《西方圣经批评引论》(商务印书馆,2006年7月第一版),就是本着以上疑惑,给中国的读者拨开圣经阐释的神秘面纱的著作。圣经之需要阐释,作者在该书洋洋洒洒的大篇导论里有翔实交代:比如圣经不乏前后重复甚至矛盾的叙述,像在洪水方舟的记载中,先是说挪亚将飞鸟、牲畜、昆虫每种一对带进方舟,可是后来又说他将每种七对带进了方舟。又如摩西的名字先是说叫“流珥”,可是后来又成了“叶忒罗”,再后来更是变成了流珥的儿子“何巴”。又如圣经中有不少超自然的奇迹描写,像在《出埃及记》里,摩西使红海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通过,复回流淹毙法老追兵;在《约书亚记》里约书亚求得上帝让太阳月亮停在空中不动,令白昼延迟,把敌人赶尽杀绝,这些记述作神话理解自然好办,可是假如有的教派坚持圣经字字

为神所言,所以即便奇迹,也具有充分完全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性呢?再比如,《旧约》里许多领袖人物的行为令人发指,大卫占人妻子又借刀杀人,所罗门好大喜功骄奢淫逸,耶户党同伐异杀人不眨眼。据信为大卫所作的《诗篇》,虽然敬神的虔诚无以复加,可是同仇敌忾也着实血腥,甚至诅咒要把敌人无辜的婴孩摔死在磐石上。圣经的文字是神圣的文字,而上面这些或者是自相矛盾,或者是匪夷所思,又如何叫人体味其中的神圣两字?这可见,圣经的阐释非但势在必行,而且是当务之急了。

感谢本书的编者梁工在努力满足我们的这样一种阐释之必须。梁工师从已故的朱维之先生,近二十年來孜孜矻矻,韦编三绝,投身于圣经文学的研究,可谓是皓首穷经。在他近年出版的大量有关著述中,笔者以为《西方圣经批评引论》独树一帜,因为它让中国读者认识了西方解经传统的一个面貌,而这个传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,我们迄今还是相当生疏的。除了在导论部分详述了西方圣经批评的来龙去脉和流变线索,该书结构体例上,则是从阐释学、形式批评、社会学、女权主义以及弗莱的原型批评等等不同侧面来言说圣经阐释的学问。比如女权主义,她们读到《马可福音》里有个女人打破玉瓶,把非常珍贵的香膏倒在耶稣头上,当时耶稣就说,“我实在告诉你们,普天之下,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,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,以为纪念。”(14:9)可是这位女先知是谁呢?没人知道。我们知道耶稣的十二个门徒,甚至很熟悉出卖了耶稣的犹大,然而耶稣这位忠心耿耿的女性门徒,却是无可奈何地被人忘却了。所以,女权主义致力于在圣经里发掘那些被埋没的、消隐的、遗忘的女性形象,意义无论如何是不容低估的。

梁工对圣经研究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。他认为圣经弘扬的是健全的精神、明智的理性和崇高的信仰,故圣经中的上帝和耶稣可视为道德和正义的化身。如此从文化层面解读圣经,实即引导人摆脱野蛮鄙俗而进入文明之境。要之,一代代圣经学者乐此不彼为之献身,不亦乐乎。这种学术态度凸显了圣经研究的当代意义,实在有益于中国学者从圣经中开采他山之石而为己所用,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作出独到的贡献。